

国 家 博 士 后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GUOJIA BOSHIHOU KEXUE JIJIN XIANGMU

皇甫晓涛◎著

文化产业新论

14项

可能推动世界财富中心转移的新论点

14XIANG

KENENG TUIDONG SHIJIE CAIFU ZHONGXIN

ZHUANYI DE XINLUNDIAN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文化产业新论

皇甫晓涛◎著

WENHUA CHANYE XINLUN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产业新论 / 皇甫晓涛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438-4780-4

I.文... II.皇... III.文化-产业-研究 IV.G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9721 号

责任编辑: 李 进

装帧设计: 杨丁丁

文化 产业 新 论

皇甫晓涛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 410005)

(营销部电话: 0731-2226732)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汇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75

字数: 419 000 印数: 1-6000

ISBN 978-7-5438-4780-4

定价: 39.80 元



序一

胡惠林

我是在2005年应邀出席由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举办的“云南文化产业论坛”上与皇甫晓涛教授相识的。当时他把他在清华做博士后的一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文章给我看，其选题的新颖、视角的独特和思想的深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便与晓涛教授就文化产业研究领域里彼此感兴趣的问题多有切磋和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对他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新思维”“新方法”和“新观点”多有了了解。现在，晓涛教授的大著《文化产业新论》要出版了，他请我为之写一篇序，实在是颇感惶恐。虽说在此之前也曾有文化产业研究者请我作序，但迄今为止，应允为本书作序还是第一次。一来几年间我与晓涛教授切磋颇多，二来晓涛教授的这本大著的研究大纲和前期的一些研究成果，我不仅曾先睹为快，而且在我执行主编的《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的第4卷上也曾发表过他的学术论文。乘此晓涛教授的大著出版之际，就他的研究成果谈一些感想，与晓涛教授和读者作一交流，以期共同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也是应该的。

文化产业研究较为困难的，一是学科定位与跨学科的知识融合，使得迄今为止文化产业研究的学科身份还在讨论之中；二是产业经济学核心理论的深入与产业相关的文化理论的展开、融合，使得文化产业的阐发、叙述结构与研究类型、技术模型，难于形成一

以贯之的学术理论体系；三是中国新文化实践、新经济实践、新科技实践、新创新实践的结合，面临着一个新的变革与挑战；四是与大国成长之核软实力的建构的内在联系，使得文化产业研究对民族复兴原理、理论要有新的求解；五是文化产业教学活动、学科建设及教材体系的历史性要求，正在重构整个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使得文化产业在当代中国的研究中，承载着更大的历史负担。而晓涛博士的大著，却在大量调研、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上，对这些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科研与教学的难题，作出了自己自成体系的系统探索与阐发。

关于文化产业学科定位与跨学科的知识融合，作者从人文科学以史论为基础的符号模型、自然科学以数论为基础的技术模型、社会科学以本体论为基础的生产模型等多个理论模型为分析手段，探索了文化产业研究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重构的一系列实质性的问题，如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的分类，文化产业研究与自然科学的裂变，中国文化的复兴，当代文化思潮的更迭，生态文明的兴起，本土文化的重构，世界财富中心的转移及文化产业学科的规划体系等，形成了文化产业研究跨学科整合的知识融合系统，奠定其理论基础的基本范畴、体系及科学结构。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作者在深入研究文化产业的核心理论问题时，始终关注着国际学术前沿的动态与国内文化产业实践发展的动态。对于文化产业研究必须解决的产业经济学及产业资本理论的核心问题，作者从资本理论、文化资本到产业理论、产权制度及相关的管理理论与创新理论，从戈森规律的物质资本原理到边际效益递减的产业经济规律，都提出了新见解，并由此形成其后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将以研究物质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经济学原理，转向研究物质与文化双重建构的后经济学创新体系。同时，作者也在对十大经济原理的批判中，结合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观、自主创新观、全球战略观的国家创新体系及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建立了自己文化经济学与文化产业研究的后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解系统。正是在这一研究起点与叙述结构中，作者展开了对于符号经济理论、媒介经济理论、文化经济理论、知识经济理论等与产业相关的文化理论的探讨，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学术理论体系。因而《文化产业新论》这部著作的问世，也可以作为一部具有学术特色的教材成为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前沿成果，为高校及文化产业领域的人才培养做出新的内容拓展。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资源大国、人文大国，中国能否在未成为工业大国、科技大国的前提下，跨越工业物质与科技制造阶段而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文化大国，这是“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斯密



难题、“中国近代为什么科技落后”的李嘉图难题、“1750年后的中国经济为什么不再强大”的罗伯特难题中,关于近代中国文化、科技、经济三大难题都未曾遇到的世纪难题。这也是贯穿本书的一条基本理论路线,其中隐藏着作者对于百年以来中国落后挨打境地的文化反思,隐藏着作者对于近年中国发展的深远的忧患意识,隐藏着对于中国崛起的文明渴望,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本书写作的知识起源与科学动力,其中充满着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辩证思维与科学理性的光辉。我们姑且把它叫做“中国为什么能够跨越发展”的新世纪难题,解答这个难题不仅需要科学的勇气,更需要科学的智慧,科学的知识,科学的理论与科学的思想。皇甫晓涛教授试图用1750年以来人类的十四大发明体系对于中国四大发明思维方式的超越,及其在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实践中成功运用形成的知识原理,来破解这一难题。这使本书“形散神凝”,形成散点透视的理论焦点与分析框架。比如非物质经济的创新跨越、资源动员的资本跨越、文化创新的和谐跨越、服务产业的转型跨越、城市化后建设体系的发展跨越、文化法权的产权跨越、生态经济的文化跨越、区域经济的科学跨越等,都是围绕着这一“新世纪难题”跨越发展的创新模式展开的。

诚如著者所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特征,同时在产业融合、知识融合、科技融合、文化融合中从物质化的农业经济与工业化的物质经济向非物质化的服务经济、信息经济、生态经济、文化经济、符号经济、媒介经济跨越,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作出这样跨越的核心经济体系就是由信息技术、科技创新带动的文化创新与文化产业。这就是为什么文化产业研究具有如此之大的学科跨度,并且需要如此深广的专业基础的原因。

关于中国能否在现代化发展中超越工业化的物质经济阶段这一“霍夫曼定律”,曾是中国都市创新与产业重构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产业经济学原理必须面对的一个时代难题与重大前沿问题,也应该是文化产业研究关注的核心理论与实践发展问题。这一问题曾因大连环境经济的非物质化跨越发展、深圳外向经济的“适度重型化”发展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及争议,这一问题也因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与方针的根本问题,长时期困扰着人们的思路与抉择。晓涛在本书中对上述难题的求解,则从非物质经济原理、后经济原理、文化经济原理的反思经济学中提出了自己的求解方程,这一求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理论,对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从外向型经济到自主创

新转变、从物质经济到非物质经济的系统阐发与理论建树,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产业已从工业中解放出来,产权也与国家主权、国际法权愈来愈为密切相关,科技制造也从物质经济走向文化创造的非物质经济,这就是后经济的柔性生产方式及弹性生产方式的软化升级,它再也不像大工业的制造体系那样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物”,成为仅靠能源消耗而增长的科技制造王国,而是在资源再生产的文化创新中走向“细分的世界”专精化的财富王国。北京知识经济的贡献率为40%多,而工业科技贡献率仅为6%,其中30%多都是非物质化的服务经济。日本丰田车每年5万亿日元的产值,工业科技贡献率的钢铁制造业产值为50%,汽车配置的电子音乐、通讯与文化符号的“柔性生产方式”产值为50%。从中可见产业的内容正在悄然移向非物质经济的文化创新中。中国的崛起,举世关注,然而它在非工业化的跨越发展中,是怎样在城市化的文化创新中形成近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的。本书作者从文化创新的后经济学原理中对此给予了足够的理论关注与知识阐发,从文化经济的技术路线提出了对这一新世纪难题的破解理论,无论是大连的环境经济、东北的区域经济发展,还是云南的文化产业、广东的文化经济发展,和对国家文化产业案例分析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理论建构的创新价值。

晓涛教授有着在基层政府工作的经验。在时代前沿的社会实践中,他一刻未曾停止过对中国难题与中国文化的思索,并于此间做了大量的调研与案例研究。他曾说他的思索一来得益于他与这个时代的城市、创意、经济、文化、产业共同完成身历其间的转型,二来得益于全球化开局以来与大国之核共同成长的追索,三来得益于在这不停歇的跨领域追索中,刻苦的学习与勤奋钻研。本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是为序。

2007年2月27日写于
香港浸会大学吴多泰国际中心

香港浸会大学吴多泰国际中心



序二

裴长洪

继生产力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之后，作为全球经济领航与“寻底竞赛”(race to the bottom)原理求解的文化经济、文化产业又进入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在生态经济、信息经济、全球经济、知识经济、创意经济、循环经济、体验经济、休闲经济、媒介经济、符号经济的后经济体系中越来越为重要地成为国家创新机器与全球竞争战略，引起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及学术文化及经济理论界的注意。

本书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与经济理论注意的是，它在资本理论、产业理论的经济学核心环节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时代前沿问题，并深入细致地在经济学原理的读解、批判中，提出新的时代课题与理论思考，比如著者对资本理论物质资本边际效应递减的戈森规律，提出非物质经济与文化产业代际递增的逆戈森规律，比如对于经济学选择原理等基础理论、基本范畴的物质经济原理的反思，从而形成非物质经济原理的反思经济学、后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从反思人类学、反思文化学到反思经济学，是有着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科学发展观文化经济学对于资本、资本理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资本的生产力经济原理的批判思维、理论支撑与科学体系的，对此著者都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思考与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认知、鉴识科学的探讨；又如对于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

马克思的“庞大的商品堆积物”，庞巴维克的“第三个馒头”的物质资本分析，到对于布迪厄“可交易的身份”，林楠的“动员过第二次的资源”的非物质资本理论的归结与分析，都可见出作者对于经济学核心理论的深入钻研与理论功底。而对产业理论的探讨，更是将其从经济组织的研究，推向创新机器的新阶段，并将其作为1750年以来人类新发明体系的创新要素与文明之核，探讨了他与其他13个发明体系的关系及其创新、发明的内在规律，从人文科学符号模型的产业元素、自然科学技术模型的生产要素，到社会科学经济模型的管理元素、认知科学数据模型的创新要素，鉴识科学测绘模型的财富元素，都形成对于产业、产业理论及产业科学的再发现，这对于经济理论、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原理的再发现都是大有裨益的探索。由此，作者深入到知识资本的经济体系、社会资本的经济体系、产业资本的经济体系、后资本的经济体系、博弈资本的经济体系、创意资本的经济体系、文化资本的经济体系、媒介资本的经济体系、制度资本的经济体系、符号资本的经济体系、城市资本的经济体系、生态资本的经济体系、区域资本的经济体系、安全资本的经济体系，展开了对于文化产业与产业创新的系统探讨，包括对产业要素的生产标准、产权博弈、体制机制、资源内容、企业组织等，都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思考与学术探讨。每当大的时代转型的经济革命时期，都会有人文学者跨过学科界限，闯到社会科学的经济学领域，下大工夫展开其思想的创意，以完成新的经济学原理的知识整合。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分明感到文化、文化创新与文化产业不仅正在从生产力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到创新经济学的体系上重构经济学，也在资本理论、产业理论、博弈理论、产权理论、创新理论、管理理论的经济学核心环节上重构经济原理。它试图回答的不仅是经济学发展的重大时代前沿核心理论与原理问题，而且也在对近30年来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原理与民族复兴的人文原理求解与反思中，触及到亚当·斯密提出的“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斯密难题”，李嘉图提出的中国四大发明的后面为什么科技不够发达的“李嘉图难题”，以及美国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教授提出的“中国人为什么1750年之后开始落后于西方”的“罗伯特难题”。同时作者在从产业、产权、资本、资源与文化、创意、符号、信息联系中，展开其对后经济体系核心理论的构筑及近代中国三重难题的求解，在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新、科技融会与产业融合中系统阐发他的文化经济与后经济理论，并对其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认知科学、鉴识科学的跨学科知



识创新特征作了系统的阐述,同时试图求解文化与经济、创意与产业、内容与版权、中国文化与全球化的多方面联系及正关系的生产力结构。

相信本书不仅对于经济学重构的核心理论会有建设性意义与学术启迪,对于文化理论也会有多方面的建树与思想启迪。此外作者对于城市、区域、生态、国防的文化经济与文化战略研究,也形成多方面的学术创新与一以贯之的学术体系。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物质生活,而反思经济学与后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却是非物质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关联,研究的理论向度也由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线性思维转向以增长方式创新为核心的圆型思维,关注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庞大的商品堆积物”与“看不见的手”的“边际递增效应”,而是资源能耗、创新、内容、符号的代际扩张与交易模式、创新模式。文化与文化研究、文化思维及人文价值观、科学发展观、和谐世界观的介入,对于经济理论的促进与发展无益是一个进步。同时它也挑战、求解大国成长、大时代跨越的大的经济难题与问题,引发我们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兴趣与多方面的研究热望。希望作者能够沿此作出更为深入的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作者作出了新的努力和开拓,形成了较为严谨与成熟的知识体系,虽然其方法论与研究模型有待于完善与商榷。但作为人文科学、认知科学与鉴识科学的经济学及后经济理论,却在文化产业的系统研究中为我们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与方法论体系,我们认为它还是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力与更加严谨科学的科学体系的。经济学也正在从传统的社会科学中走出来,越来越多地成为跨学科的理论创新。这也是一个新的研究基础与方向,理论基础与学术体系,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肯定与深切的学术关注。同时作为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与文化经济学的科学发展的前沿教材建设,本书也是在作者近年系统的教学与科研探索上形成的教学相长的理论著述,兼顾了教材学科知识的专业基础性与学术创新体系的前沿性,也兼用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认知科学与鉴识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兼有文化研究与经济学理论的专业基础与学科建设的教材使用价值,期望在今后的教学与科研中能够得到不断的丰富、发展与完善。

2006年12月22日于北京



自序 (一)

大国崛起与跨越发展的科学文化观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从富到强的创新过程，一是要强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二是要强在和谐发展的文化，三是要强在跨越发展的创新。科学基础，和谐文化，创新体系，是中国科学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创新意识形态的国家主流文化之核。

这是千年古国的文化巨变，是创意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大国成长的巨人呐喊。科学发展观包括科学地对待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科学地认知大国成长的创新模式与发展规律，科学地把握增长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科学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技术的进步，科学地尊重可持续发展的规律与市场经济活力，科学地制定政策法规与全球博弈国策，科学地对待生态环境与自然、人文，科学地对待历史文化与文化遗产，科学地对待国际关系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和谐文化，就是要建立和谐社会机制，建立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社会机制与文明形态，建立人与自然、生态与人文的和谐机制与文明形态，建立经济与人文、文化与产业、创意与资本的和谐机制与文明形态，建立科技与社会、科学与发展、人文与科技的和谐机制与文明形态。并在这一文明体系的创造中奠定大国成长的科学基础。

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就是要坚持发

展的科学基础与科学方法,要建立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和谐形式与公平机制,要用创新的方式走出从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的跨越发展之路,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的后面走。要在跨越发展中走出大国崛起的创新之路。这就是跨越发展的科学文化观,也是大国崛起的创新灵魂与核心内容。

中国作为一个资源大国、人文大国,在文化大国的创新发展中,是能够超越工业化进程物质经济阶段的“霍夫曼定律”的历史逻辑,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科技大国、文化大国的强国的,这是在全球化开局中大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与文明演进,这一文化超越与历史腾飞的科学基础与文明内核,就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文化观的科学文化观文明基石。

在印刷文明时代,中国作为人文大国,曾在文化与经济的文明双核中站在世界历史的峰巅,它以和谐文化的巨人之魂与天人合一的科学理性,不仅建立了繁盛的农耕文明与文官制度,而且也将边塞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的冲突相融为元蒙满汉等多民族融合的中华盛世。在工业文明时代,中国文化由于缺乏科学元素与技术元素而落伍于他人,由于缺乏科学创新的活力、体制与技术制造的产业、能力而落伍于他人;在信息文明时代,中国文化由于信息技术落伍于他人而被动一时。但中国人在近代以来的反思中,奋起直追,在工业化的赶超中,直接进入了信息技术装备的文化产业创新中,在跨越发展中,超越“霍夫曼定律”的工业化逻辑,开拓以文化为基础的经济创新之路与和谐发展之道,形成大国崛起的全球博弈基础。

在这一伟大的创造历程中,中国人在以全新的方式读解、创造与使用“知识”,形成“知识资本”的大国成长之核。中国人在以全新的方式读解、创造“社会”,形成“社会资本”的发展基础与机制。中国人在以全新的方式读解、创造与使用“产业”,形成“产业资本”的增长方式与创新模式。中国人在以全新的方式读解、创造与使用“经济”,形成市场经济的“后资本”创新体系与“后经济”的生产机制与体制。中国人在以全新的方式读解、创造与使用“产权”,形成版权经济的“博弈资本”规则与生机。中国人在以全新的方式读解、创造与使用“创新”,形成“创意资本”的后发优势与大潮。中国人在以全新的方式读解、创造与使用“传播”,形成“媒介资本”的生产方式与内容产业起势。中国人在以全新的方式读解、创造与使用“文化”,形成文化经济大潮、“文化资本”创新的跨越发展之路。中国人在以全新的方式读解、创造与使用“体制”,形成体制改革的创

新空间与“制度资本”科学成长基础。中国人在以全新的方式读解、创造与使用“资源”，形成非物质经济发展的“符号资本”与文化产业链。中国人在以全新的方式读解、创造与使用“城市”，形成都市区域化的创新模式与“城市资本”的成长方式。中国人在以全新的方式读解、创造与使用“区域”，形成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中部、西部的区域创新与“区域资本”增长极。中国人在以全新的方式读解、创造与使用“生态”，形成环境经济的创新模式与“生态资本”的和谐文化。中国人在以全新的方式读解、创造与使用“国防”，形成和平发展的大国崛起之路与“安全资本”的和谐世界之本。这十四个发明体系的国家创新之核，既超越了中国四大发明的创新之本，又超越了“霍夫曼定律”的历史难题，超越了“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斯密法制难题，超越了“中国为什么近代落伍”的李约瑟科技难题与罗伯特经济难题。这就是科学文化观所形成的十四大发明体系对于大国崛起的创新推动与文明逻辑演进。

大国崛起，是科学文化观的创新目标与战略宗旨，科学文化观，是大国崛起的创新基础与内核。大国自觉的发展崛起，是文化的自觉，科学的自觉，是与全球博弈相对称的大国创新与成长之路，也是科学与文化相和谐的创新发展之路，是大国与世界相和谐的崛起、成长之路。足见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观的深谋远虑与意蕴深长。

和谐社会、和谐文化与科学发展、跨越发展，还包括对于世界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扩大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科技进步与大国竞争单极化、宗教文明复兴与民族矛盾尖锐化等人类文明反文化倾向的反思。因而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政府在“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国家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建设中，开始了和谐文化的构筑与为最广大农民群体利益努力的国家科学理性建设。而后是对知识分子创造力的关注与知识分子阶层崛起的文化科技政策支持，对国防文化主体的关注与国家安全卫士群体的强有力经济支持。这是大国崛起的历史跨越与巨人呐喊的洪钟大吕之鸣，也是本土性、人民性的文化重构与国家科学力量的成长。

跨越发展的科学文化观，也是创意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民族复兴的总纲领，是大国崛起的旗帜、方向与方法论的思想理论基础。



自序 (二)

创意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中国本是个文化大国,创新大国,五千年文明,两千年文化,四书五经,六艺诸子,四大发明,诗梦之国,文官制度,庄园经济,自然之道,礼仪之邦。然而由于近代中国法制、科技与产业的落后,一夜之间,被西方坚船利炮打破了国门,陷入百年以来的落后挨打境地,于是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开始了欧风美雨的西化启动的现代化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大家巨子,鲁迅、郭沫若等。

在又一个世纪开始的全球化民族复兴中,经过百年以来西化、现代化之路的求索,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思辨过程,中国人又开始了本土化、民族化的文化重构与文明再造,开始了创意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它不是简单的文化回归与缅怀,而是经过西化、现代化、世界化、全球化之后的真正文化创新与复兴,这将打通文化与法制、文化与科技、文化与经济的关联,在文化创新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中,重构本土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全面发掘创意中国的知识元素与文明要素,形成全球化开局的国家创新之核,与世界非物质经济财富大转移的大国跨越崛起之魂。这就是创意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曾提出“中国人为何勤劳而不富有”的斯密难题,认为由于中国关于

产权制度与经济法制的健全,阻碍了中国财富的增长,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关于近代中国落伍的法制文明难题。近代西方哲人李约瑟先生随之又提出“中国为什么近代落伍”的李约瑟难题,认为由于清王朝只注重国家财富的保护而忽略世界科技的发展,使中国失去了近代发展的先机,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近代中国落伍的科技文明难题。近年又有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罗伯特教授提出“1750年后的中国为什么落伍”的罗伯特难题,认为由于中国没有产生株式会社的产业组织与经济制度,使中国失去了经济活力,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近代中国落伍的经济难题。这三大中国难题,使中国文化、文化资源、知识资本与经济发展、财富增长断了关系,使中国文化与法制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断了关系,今天我们要重构的中国文化,正是在国家文化资源版权建设、文化技术创新、文化产业发展的起点上来倡导创意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中国文化与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最早建立联系的,就是汉代印刷术出现以后,对于中国夏商周上三代华夏文明的重构,于是出现了四书五经,梁启超先生说“六经皆史”,说的就是汉人对于华夏文明的文本阐发与经史重构,于是出现了史官文化,并以之进入道德、教育、法制、政治、艺术等上层建筑的汉王朝意识形态重构,开设书院,开科取士,形成汉唐意识形态的文明轴心与诗梦之国、礼仪之邦、科举之制的王化与文化互动机制与体制,并由此形成丝绸之路的王化之风与开化气象,形成汉唐文明的诗学、经史、教育、礼仪、歌舞、建筑、服饰、艺术、书法的时尚之风与风化之气、文化之体,并在庄园经济与耕读人家的自然与人文、物与我、仕与隐的互动中形成内圣外王的文化生机与万千气象。《西厢记》的离愁别恨、陈世美与秦香莲的恩怨情仇、《红楼梦》的红楼之梦、李白杜甫的离愁别绪,都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故事、文本与情结、意境。

由此涉及到中国四大发明的国家创新之核,其中有两项都与文本的制作、传播技术相关,即印刷与造纸,带来了汉唐文明的繁荣与唐宋文化的成熟。然而四大发明都因缺乏相关的产业、产权、科技、文化链接而最终落伍于他人。印刷术与造纸术的千古文本技术不变,使我们失去了信息技术、媒体技术与传播技术的创新链接,使我们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型中一直落后于他人。指南针的发明,由于缺乏新材料技术玻璃工业等的创新链接,使其不能用于航海与海权的商贸拓展,只能用于看风水的勘舆术的家园建筑与建设。火药的发明,由于缺乏钢铁工业的创新链接,只能用



于礼仪庆典的鞭炮礼花制作,反而被别人掌握并研发后用来打破我们的国门。这是我们对于三大中国难题与中国四大发明的文化反思。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一个从法制、科技到产业全面动员与复兴的创意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是用文化创新带动文化产业的全面文化复兴与伟大民族复兴。

季羨林先生曾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但中国文化如果都是他者的产权与版权体系,那将是国家与民族主权空心化的最大悲哀与问题,美国已用我们的《花木兰》赚了几亿美元的版权收入,韩国人已注册了我们的端午节。

国家之核在于创新,创新之核在于文化,文化之核在于产权。在全球化开局的经济博弈中,世界财富重心的大转移,形成了大国成长的文化之战。谁占领了你的文化领土,谁就拥有了你的商业领土;谁拥有了你的商业领土,谁就占领了你的国家主权、知识产权、文化法权空间,你的领土主权就会空心化。欧洲的创意经济,美国的版权经济,日韩的内容产业,中国的文化产业,都在全球化的文化运动中成为非物质领土扩张的世界财富大转移的轴心体系。就是说,新的文明中心,就是文化的轴心,文化产权的轴心,创意产业的轴心,也是世界财富的轴心。9.11之后,美国人悄然将用高新技术装备的新工业体系,转向了用信息技术装备的文化版权体系,原因即在于此。亚洲金融危机后,日韩的再度崛起,靠的就是内容产业、创意经济与文化产权的扩张。由此形成了欧洲创意经济的后资本主义、莱茵资本主义创意之都的文化帝国,比如伦敦、巴黎、维也纳、鲁尔、柏林从工业之邦到创意之都的转化与重构;形成了美日韩太平洋新资本主义的文化帝国,如美国的核心版权经济与日韩的内容产业体系;形成了中国跨资本主义的文化崛起,如珠三角文化大省建设与文化经济发展的沿海新开放优势,长三角世界城市群的崛起与文化名城世界经济舞台的构筑,比如世界会展商业名都上海、古都文化名城南京、休闲文化名城杭州及北京创意文化产业的崛起,形成了从深圳人开放、浦东人开发到中关村人创意的跨文化资本与新文化运动,带来了创意中国的大国崛起之风与文化复兴之风。

创意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创新、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与方法等,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一)与物化、城市化结合,在创意城市的平台上,展开创意经济链的文化产业空间与舞台

1. 注重新媒体与文化传播技术,注重传播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力的



结合,注重城市品牌与符号资本的结合,注重城市文化与文化资本的
结合。

2.走出文本的创造,展开创意经济的核心环节与文化载体,如中国
文化标志城、汉字文化城、古代西域三十六国文化城、丝绸之路文
化城的开发与建设。

3.注重文化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注重信息技术与生命科学技术、
新材料技术及认知科学技术的结合,形成文化生产力的国家文化创新
体系。

4.注重人文与自然的结合、文化与生态的结合、城市文化与生态
文化的结合。注重文化资本与制度资本、商业资本的融合、互动与建
设体系。

(二)注重文化版权建设与知识产权建设,注重文化产权与国家主 权的结合

1.建立国家文化版权资源体系。

2.建立文化技术版权体系。

3.建立文化服务版权体系。

4.建立文化贸易版权体系。

(三)加强工业化、城市化的信息化、知识化、服务化、非物质化 新文化运动的创意经济发展

20世纪,美国人将最先进的材料和设备装备到五星级社区上,形
成顶级服务产业,本世纪,美国人又在“寻底竞赛”中,将最先进的
技术和材料装备到最小的芯片上,形成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优势。
王府井CBD商圈每平方米GDP是全国城市每平米GDP的10倍,但
中关村CTV科技文化谷的非物质经济园区每平方米GDP是王府井的
10倍。中关村半年产值为4000亿人民币,是一个工业大省的全年产
值,是美国军费半年开支的1/8。

(四)加强总部经济建设、俱乐部经济建设的新文化运动内容,更 好地形成创意经济的产业组织运营平台与服务平台

1.注意总部经济的产业新文化运动内容,加强总部经济的文化经
济与文化资本建设。

2.注意俱乐部经济的城市新文化运动内容,加强俱乐部经济的文
化资本与文化建设。注意俱乐部经济从设施产业、在场产业到在线产
业、在版产业的转化与升级,产业链的形成与开发、运营,如凤凰卫
视俱乐部文化地产的开发,央视“百家讲坛”自组织创新体系的形成
与在线俱乐部产业链的开发。